

戴理达◎著



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的 共生关系研究

SYMBIO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LLECTUAL
CAPITAL AND MATERIAL CAPITAL



中国经济出版社
CHINA ECONOMIC PUBLISHING HOUSE

徐州工程学院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的 共生关系研究

SYMBIO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LLECTUAL
CAPITAL AND MATERIAL CAPITAL



戴理达◎著



中国经济出版社
CHINA ECONOMIC PUBLISHING HOUSE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的共生关系研究 / 戴理达 著.

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16. 7

ISBN 978 - 7 - 5136 - 4263 - 7

I. ①智… II. ①戴… III. ①资本—研究 IV. ①F014. 3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32076 号

责任编辑 闫明明

责任审读 贺 静

责任印制 马小宾

出版发行 中国经济出版社

印 刷 者 北京九州迅驰传媒文化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各地新华书店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20

字 数 285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7 月第 1 次

定 价 58.00 元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西工商广字第 8179 号

中国经济出版社 网址 www.economyph.com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北街 3 号 邮编 100037

本版图书如存在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中心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10 - 68330607)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10 - 68355416 010 - 68319282)

国家版权局反盗版举报中心 (举报电话: 12390) 服务热线: 010 - 88386794

中国的制造业正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双重挑战：一方面，如何通过改善生产要素的供给质量与效率破解供需结构性矛盾；另一方面，如何通过自主创新淘汰过剩产能、实现产业结构升级。这一系列挑战均发端于全球新经济背景下的“新技术革命”，智能制造、大数据和工业互联网将成为我国制造业在未来实现内涵式发展的主流方向。

产业是宏观经济的中观构成，而资本则是产业发展的微观细胞。资本运动、产业发展与经济增长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产业发展是经济发展的核心，资本运动则构成了产业效率的前提。目前中国的供给过剩并非绝对过剩，而是结构的失衡。从微观来看，即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的存量、增量、运动方向与运动幅度出现了非理性的匹配，从而束缚了企业自主创新的动力与能力，抑制了资本本身的价值功能。从现实来看，我国的供给过剩与供给不足同时并存：传统工业行业诸如煤炭、钢铁、水泥、纺织等产能严重过剩；而与此同时，以智能制造为核心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因此，本研究拟从微观的资本视角来解读这一矛盾并寻求优化路径。

共生，即不同种属的物质出于某种永久性的联系而生活在一起，是“新普遍主义”在自然物质世界的一个映射，其核心要义在于个体发展有赖于公共理性而非个人理性、群体进化有赖于每一个参与者彼此之间的交流、互补与协同。资本共生关系即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为了保值增值之诉求结合在一起而发生的一系列关系。共生关系的核心即道之共通，通则共

存。因此，客观上有必要将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放在同等的战略地位。否则，就等于又回到了“生物圈内是老虎重要，还是老鼠重要？”的二元对立。

本研究首先通过理论梳理和逻辑推导构建了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共生关系图谱，界定了“共生单元”“共生引力”“共生界面”“共生环境”和“共生能量”等五大关系构件；其次，本研究提出了由静态层面的规模匹配走向动态层面的资本效率的“逻辑判断”式二次评价体系，并运用数据包络分析（DEA）对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资本共生关系进行了量化评价；然后，运用 SPSS 软件对两类资本共生关系的影响因素以及这一关系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机理进行了实证分析；最后，由于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共生关系并非一个静态存在，而是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其演进具有一定的路径依赖性和较强的风险。因此，在借鉴环境论、风险控制论等理论基础上，设计了“跟进式”与“引领式”两种环境调适模式，并根据风险因素的 AHP 测度结果提出了相应的控制方法。

该研究的主要贡献在于通过借鉴自然科学的成果拓展了资本研究的视野，结合主体生产力与客体生产力的运动规律，从资本生态的角度探寻了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的关系及其与价值创造行为之间的关联，打破了就智力资本论智力资本的封闭式价值创造思路；通过“资本—运动—关系—价值”的研究逻辑，揭示了企业价值对资本运动及其关系的路径依赖，并从可操作层面为共生关系的评价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

第一章 绪 论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001

1.1.1 研究背景 / 001

1.1.2 问题的提出 / 004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006

1.1.2 研究目的 / 006

1.2.2 研究意义 / 007

1.3 研究的主要内容 / 009

1.4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010

1.4.1 主要的研究方法 / 010

1.4.2 技术路线 / 012

1.5 主要的创新之处 / 013

1.5.1 理论层面的创新 / 013

1.5.2 操作层面的创新 / 014

第二章 国内外研究现状与述评

2.1 智力资本相关文献 / 016

2.1.1 不同研究视角下智力资本内涵的界定 / 016

2.1.2 智力资本的测度 / 025

2.1.3 智力资本与企业价值的相关性 / 032

2.2 资本共生相关文献 / 037

2.2.1 自然科学视阈下的“共生”现象 / 037

2.2.2 社会科学视阈下的“共生”现象 / 041

2.2.3 资本共生关系与价值创造之间的关系 / 048

2.3 国内外相关文献的述评 / 049

第三章 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共生的理论溯源

3.1 劳动价值论 / 052

3.2 利益相关者理论 / 056

3.3 协同论 / 059

3.4 交易费用理论 / 063

3.5 商业生态系统理论 / 065

3.6 “结构洞”理论 / 069

3.7 本章小结 / 070

第四章 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共生关系的构建

4.1 共生规律的描述 / 073

4.1.1 “质参量”与“象参量”——共生单元内、外性质的表征 / 073

4.1.2 “共生度”与“共生系数”——共生行为关系的描述 / 074

4.1.3 “共生密度”与“共生维度”——共生均衡条件的测度 / 076

4.2 共生单元的识别 / 077

4.2.1 物质资本共生单元 / 077

4.2.2 智力资本共生单元 / 082

4.3 共生引力的判断 / 089

4.3.1 共生引力的内涵与特征 / 089

4.3.2 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的共生引力 / 092

4.4 共生界面的选择 / 096

4.4.1 共生界面的特征与选择原理 / 096

4.4.2 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的共生界面 / 100

4.5 共生环境的营造 / 110

4.5.1 基于物质联系的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共生制度安排 / 110

- 4.5.2 嵌入心智模式的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共生非正式制度安排 / 115
- 4.6 共生能量的分配 / 119
 - 4.6.1 共生阻尼机制、全要素共生度及其与共生能量生成之间的关系 / 119
 - 4.6.2 共生能量的分配 / 120
 - 4.6.3 我国企业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共生能量生成与分配机制的演化 / 121
- 4.7 本章小结 / 125

第五章 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共生关系的测度

- 5.1 资本共生互惠效应的存在性:基于 Logistic 生长模型的检验 / 128
 - 5.1.1 从资本属性的视角再次梳理资本共生行为模式 / 128
 - 5.1.2 经典增长模型的回顾 / 131
 - 5.1.3 基于 Logistic 生长模型的资本共生互惠效应的检验 / 133
- 5.2 共生关系的社会网络分析 / 138
 - 5.2.1 关系、共生关系 / 138
 - 5.2.2 社会网络分析的基本构成及其内涵 / 139
 - 5.2.3 嵌入社会网络分析的资本共生关系 / 141
- 5.3 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共生关系测度体系的构建 / 144
 - 5.3.1 共生关系测度体系设计的原则 / 144
 - 5.3.2 涵盖静态与动态两个层面共生关系的评价体系 / 146
- 5.4 首次评价:基于共生度、共生系数的静态关系测度 / 148
 - 5.4.1 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的行为关系——共生度 / 148
 - 5.4.2 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的相互影响程度——共生系数 / 150
- 5.5 二次评价:基于共生效率的动态关系测度 / 153
 - 5.5.1 数据包络分析的运用原理 / 153
 - 5.5.2 基于 DEA 方法的资本共生效率评价模型的构建 / 158
 - 5.5.3 DEA 模型求解与结果分析 / 160

5.6 本章小结 / 163

第六章 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共生关系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6.1 社会经济领域共生问题的研究进展与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 / 165

6.2 研究设计 / 168

6.2.1 研究假设的提出 / 168

6.2.2 变量的界定与数据的搜集 / 175

6.2.3 研究模型的构建 / 178

6.3 假设检验与结果分析 / 179

6.3.1 独立样本 T 检验 / 179

6.3.2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 / 179

6.3.3 多元回归分析 / 182

6.4 本章小结 / 185

第七章 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共生关系影响企业价值的实证研究

7.1 从共生单元差异性的视角重构企业价值网 / 187

7.1.1 共生单元差异性与质参量兼容性的对立统一 / 187

7.1.2 资本共生单元差异性的主要表现 / 189

7.1.3 基于差异性的企业价值网的构建 / 198

7.2 研究设计 / 200

7.2.1 研究假设的提出 / 200

7.2.2 变量的界定与数据的搜集 / 205

7.2.3 研究模型的构建 / 209

7.3 假设检验与结果分析 / 209

7.3.1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 209

7.3.2 多元统计回归分析 / 211

7.4 本章小结 / 215

第八章 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共生关系的演进

- 8.1 基于能量分配的资本共生系统相变模式 / 217
 - 8.1.1 资本共生系统中共生行为模式与共生组织模式的结合矩阵 / 217
 - 8.1.2 共生系统相变的驱动 / 220
 - 8.1.3 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共生体相变的仿真建模 / 222
- 8.2 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共生关系演进的内、外部驱动 / 226
 - 8.2.1 资本共生关系演进的内部驱动:资本的“逐利性” / 226
 - 8.2.2 资本共生关系演进的外部驱动:共生界面的完善 / 228
- 8.3 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共生关系的演进路径 / 231
 - 8.3.1 基于“自组织”行为的资本共生单元遴选与匹配机制 / 232
 - 8.3.2 基于资本竞争的积累机制 / 233
 - 8.3.3 基于价值功能差异的时序组合机制 / 235
 - 8.3.4 基于市场导向的共生关系信息反馈与纠偏机制 / 236
 - 8.3.5 基于长期契约与广泛信任的共生介质优化机制 / 238
- 8.4 共生关系演进历程中共生体与环境的冲突与调适 / 240
 - 8.4.1 共生体与共生环境:谁推动谁的演进 / 240
 - 8.4.2 共生体与共生环境的“冲突源”及其进化效应 / 242
 - 8.4.3 面向共生关系优化的共生环境调适方式选择 / 245
- 8.5 本章小节 / 249

第九章 资本共生关系演进历程中的风险控制

- 9.1 资本共生关系风险的构成 / 251
 - 9.1.1 风险与风险管理 / 251
 - 9.1.2 资本共生关系风险的构成 / 253
- 9.2 资本共生关系风险的识别 / 262
 - 9.2.1 风险识别的基本流程 / 262
 - 9.2.2 资本共生关系风险的识别方法 / 263

- 9.3 资本共生关系风险的测度 / 266
 - 9.3.1 风险测度的主要方法 / 266
 - 9.3.2 基于 AHP 方法的资本共生关系风险测度 / 269
- 9.4 资本共生关系风险的控制 / 274
 - 9.4.1 共生契约订立与执行中的风险控制 / 274
 - 9.4.2 共生环境冲突与调适中的风险控制 / 275
 - 9.4.3 共生能量生成与分配过程中的风险控制 / 277
- 9.5 本章小结 / 281

第十章 研究结论与启示

- 10.1 研究结论 / 283
- 10.2 对策建议 / 285
 - 10.2.1 以供给侧改革为契机提高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的共生效率 / 285
 - 10.2.2 提供有利于提高共生能量产出水平的公共政策 / 287
 - 10.2.3 引入弹性剩余分配模式以激活隐性要素的价值潜能 / 288
 - 10.2.4 以智能制造为导向推进两类资本共生关系的正相变 / 289
- 10.3 本研究的不足与未来的研究方向 / 291
 - 10.3.1 本研究的不足之处 / 291
 - 10.3.2 未来的研究方向 / 292

参考文献 / 293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1.1.1 研究背景

1.1.1.1 “知识经济”浪潮敦促实务界重新审视价值创造方式与价值认知模式

纵观全球经济发展历程,从亚当·斯密到凯恩斯,经济主体的价值创造活动无不被打上“新古典主义”之烙印,即资源的稀缺性进而边际效应递减规律在“理性经济人”的眼里几乎不可逾越。然后,近一百年来随着要素创新、制度变迁及思维变革向经济生活的纵深渗透,对于知识的获取、加工、流动、积累与扩张等一系列行为逐步改变了人类对传统意义上要素稀缺问题的判断;同时,也敦促产业界重新审视价值创造方式,即有必要通过使用边际效用递增的智能性生产要素去结构性地部分替代或激活边际效用递减的物质性要素来实现价值增值。这一转轨“重述”了企业竞争优势对非实体性智能要素的路径依赖。

特别是20世纪中后期, Lucas (1988) 等学者基于资源观的增长理论提出了“新经济增长理论”,认为技术进步取代自然资源的排他占有成为经济增长重要内生变量。Atkinson (1969) 在分析欧美国家二战后经济复苏时提出,实体性物质资源对技术进步的贡献率相对于“隐性资源”显得极为有限。这里的“隐性资源”与同期由美国经济学家 Galbraith (1969) 所提出的“智力资本”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即知识本身并不能带来经济增

长,对知识的运用则构成了经济发展的引擎。这一概念也表明,驱动经济发展的所谓隐藏于大脑的“智力”不是一项静态的资产,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知识经济”并不是一个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等范畴相对立的新创概念,而侧重于表述在经济发展中信息、知识、技能等非实体性要素对传统生产资料与劳动对象的改造、对以“知识”为资源配置及剩余分配为基础的经济关系的重构,以及对“人”这一微观实践主体认知方式与价值取向的重塑。因此,“知识经济”不仅是价值创造的全新体验,更是人们精神世界价值认知方式转型的驱动力。

智力资本是一个既“古老”又极富时代色彩的概念,但时至20世纪末期,学术界在关于智力资本的研究上明显地出现了两种既独立又相互关联的研究范式:①“知识-智力”模式(Knowledge-Intelligence Pattern)。该模式倡导以获取、创造、扩张公司现有的知识为核心、以知识向智力的转化为驱动来赢得竞争优势,其代表学者包括斯图尔特、斯威比等。②“资源基础整合”模式(Integration of Resources-Basis Pattern)。该模式主张从智力与有形资源的独特的整合方式中汲取价值,其代表学者包括沙利文等。从这一分化可见,早期的智力资本研究多囿于知识和智力本身的价值功能,学术界单纯地将“知识、技术”等同于“价值”,而实务界的高管往往苦于公司缺乏高端的现代化制造设备而无法获得利润的持续增长。究其实质,这是一种忽视物质资本与知识、技巧相结合的片面解读。其实,即便是在技术条件有限的制造环境下,员工运用这些知识的能力、物质资本被这些知识、技能所激活的程度及其一整套独特的商业流程,“都足以将一家公司与其他公司区别开来”^①。

1.1.1.2 中国经济转型背景下各类资本的“非理性结合”引发对资本互惠共生关系的诉求

经济转型(Transition)是一个经济运行体的“结构”和“体制”在一定时期内发生的根本变化,具体涉及经济体制的更新、经济增长方式的

① Patrick H. Sullivan. Value-Driven Intellectual Capital: How to Convert Intangible Corporate Assets into Market Value[M].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Press, 2000: 19-21.

转变及产业结构的调整等方面,本质上是经济体制和结构由量变到质变的动态过程。

近年来,我国经济转型过程中依然面临着较为突出的阻力与瓶颈。一方面,从国内环境来看,市场失灵,市场膨胀、市场抑制及微观运行主体中的所有者缺位等种种非弊病加剧了市场化进程中固有的矛盾。尤其是经过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高速增长,劳动力、土地、自然资源等经济要素的成本处于持续上升的态势,传统主导行业的利润空间已经逐渐变小,行业间的要素流动由于制度的僵化而受限。此外,加之储蓄率的逐步下降,过去长期支撑经济增长的高投资模式将难以为继。另一方面,从国际环境来看,金融危机部分改写了全球“作业链”与“价值链”的格局,低端制造难以保障中国继续以“世界工厂”的身份获取国际竞争力。总之,要素创新、技术创新、制度创新是中国经济转型的根本出路所在。

若从微观角度来解读这种“结构性变化”,那么可将其视为生产要素对市场需求的应答方式发生了变化——从绝对稀缺的物质资本统领生产过程的“被动型应答”,转变为边际收益递增的知识要素引领生产过程的“智慧型主动应答”。长期以来,我们的生产方式是通过“肆无忌惮”地掠夺自然资源从而实现对人类需求的满足。在生态危机步步逼近的情况下,我们不得不重新寻求资源的获取与使用途径,因此,对智力资本的开发与利用成为创新型国家战略中的理性选择,构建创新型国家与和谐社会的倡导推动产业界逐步从“规模扩张”转变为“内涵提升”。

在这一背景下,无论是国家宏观层面还是企业微观层面,均加大了人力资本投资与研发力度。根据国家统计年鉴公布的数据,近20年来,国家教育经费总投入由1993年的1059.94亿元增至2013年的29698亿元,规模以上工业企业2013年R&D经费投入达8318.4亿元,但整体低于同期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与货币资本积累率。我国目前正处于工业经济初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的转轨过程中,企业在资本投向与配置方面存在两种非理性倾向:一方面,大量传统制造业“天然”地具有极强的资本依赖性,在“固投惯性”的驱动下试图通过货币资金、固定资产的积累与扩张获得行业利润。这种盲目的重复投资最终使整个行业竞争陷入恶性循环。另一方面,

某些高新技术型企业意识到自主创新对于保持行业竞争地位的战略意义,无视物质资本积累水平超规模地进行智力资本扩张。最终,智力资本积累与物质资本积累水平的失衡,导致高新技术缺乏与之匹配的物质载体而无法实现其应有的市场价值。

“新经济”时代,人们意识到具有高度认知能力与专业技能的“人”与“物”之间的联系比以前任何时代都更为紧密。人与人的交往、人与物的关联对社会生产力的影响更为直接。然而,随着社会分工的深入,“专才”更加关注与自身价值创造相关的行为而漠视群体交往对价值创造的影响,从而形成一种“分工性社会隔膜”。进而,“社会关系网络”“利益相关者”等理论纷纷把人与物、人与人的关系融入价值行为,试图通过“物质”“技术”与人的“情绪智力”相结合的途径来探寻新的价值创造模式。尽管资本本身所具有的“逐利性”能自发地调节其流量、流速与流向,但缺乏一定的资本生态环境与制度安排将导致资本运动效率的低下。不同类型的资本因为某种程度的永久性物质(资本增值)联系在一起即构成了社会系统的共生,构建互利互惠的资本共生关系不仅是对资本逐利性的一个理性应答,更有助于完善“人”与“物”的有效对接与融合。在此背景下,对理性、健康而富有效率的资本结合方式及其关系的研究呼之欲出。

1.1.2 问题的提出

根据中国知网的统计,近二十年来大量有关智力资本的研究登上学术舞台,这正是学术界对“知识经济”浪潮的主动响应。学术研究是对客观现实的一个映射,可见,大量的智力资本投资被实务界视为引领经济增长的“神秘武器”。从资本积累步伐来看,近年来我国制造业智力资本积累率高于物质资本积累率;但从积累规模来看,后者远高于前者。这一矛盾并非某一时期的偶发现象,而是一个长期积淀的产物。如前所述,我国的产业升级与结构调整发端于工业经济低端向高端转轨的特殊时期,一方面,智力资本积累缺乏历史积淀,原有的经济体制与制度安排严重束缚了智力资本的价值功效,以物质资本为中心的粗放式增长模式在相当长的时

期内“强化”了实务界固有的价值认知。大量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企业依然囿于“物质带来财富、资本创造价值”的传统思维,导致转型过程中两类资本的“储备畸形”。另一方面,某些新兴产业脱离我国现实进行的智力资本的超规模投资,不仅无法激活智力资本内生的价值功效,而且还引发两类资本的畸形匹配。

那么,在中国目前特定的经济背景下,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的结合方式、结合界面、结合深度和频度对二者关系的形成与维护有何影响,进而这种关系的疏密、强弱又如何地影响着企业价值的创造,都是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否则,在市场调节与政府行为对接出现裂缝且资本市场发育不成熟的条件下,若无法探寻一条构建和谐资本关系的路径,那么不同类型资本的结合渠道、结合方式乃至其价值行为将处于无序状态。

社会学认为,任何社会关系都具有路径依赖性(Path Dependence)。关系一旦建立,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既有关系会“强化”这种路径。但这种强化具有双重效应:当初始的制度安排是较为合理的,那么这种“合理性”的深度与广度将在此后得以持续放大;若初始的制度安排是非理性的,那么此后的变革将严重地受限于此前建立的制度。资本关系不是单纯的“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更多地体现为物的背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兼有自然属性的人造系统。同理,尽管各类资本之间的关系的构建具有“自组织”特征,但外生变量的影响依然不可忽视。那些来自于资本市场、宏观政策、决策者价值观的“噪声”不同程度地影响着关系的变化,长此以往,将形成一种资本运动惯性。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其资本市场已经历了商品经济的充分发育,是商品经济体内自发“孕育”的、而非外部力量强行拉动的资本化过程。“优胜劣汰”的市场规则促成了一种有利于资本合理配置的路径,并在近一百年的发展过程中得以强化。而我国的资本市场发端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是在不成熟的商品经济基础上由外部力量所推动的一场“资本化运动”。资本市场固有的配置功能更多地被“圈钱”功能所取代,大量企业企图通过IPO来实现资本的快速结合,并将“成功信号”传递给其他企业,进而形成了一种劣势资本挤占优势资本的惯性。因此,研究资本关系的影响因素及其

经济后果，实质上是探寻良性的资本结合与运动的路径。

资本保值增值即“逐利性”的内在要求客观上推动着各类资本由无序走向有序。由于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的结合并非由二者的外生变量决定的，而是由资本的“逐利性”这一内在的、本质的属性所驱动的，所以，“逐利性”这一引擎构成了研究资本关系的切入点。资本关系最终将落实到资本运动效率及企业价值上，因此，本研究拟以生态学中的“共生理论”为研究基础、以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为理论基石、以运筹学中的数据包括分析（DEA）为测量手段，并辅之以社会学中的“社会网络分析”“利益相关者理论”，探寻以下核心问题：

第一，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能否构建“共生体”，即回答“构建资本共生关系的驱动力是什么？相应的环境与规制如何？”这一系列问题；

第二，中国情境下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共生关系的具体表现，即回答“非对称性互惠共生关系的客观存在性及其特征”；

第三，以沪深两市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二次评价体系，进行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非对称性互惠共生关系的量化测度，即回答“不同板块的样本公司的资本共生关系是否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差异产生的动因有哪些？差异有何具体表现？”等问题；

第四，以我国制造型企业非对称性互惠共生关系为被解释变量，从企业微观层面探寻关系背后的影响因素，即回答“财务、创新、税收、共生损耗、共生能量等变量如何影响着静态与动态共生关系”这一问题；

第五，尽管整体上我国制造业两类资本的共生关系呈“非对称性互惠关系”，但不同样本资本共生关系的强弱客观上存在差异，这种差异与企业的价值是否具有线性关系，即回答“资本共生关系如何影响企业价值”这一命题。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1.1.2 研究目的

“共生”本身是自然科学领域（生物学）的一个概念，但20世纪中后